

埃德加·斯诺眼中的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

蒋杰

1932年1月28日夜，日军不宣而战，突袭闸北，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就此打响。此时年仅27岁的斯诺正在上海，由此成为事变的一名亲历者。在三十余日的交战中，他凭借外国记者的身份，进行了大量实地采访，完整详实地记录了所见所闻，并在一年之后推出了《远东前线》(Far Eastern Front)一书。他亲眼目睹了日军与日本浪人的种种暴行，更见证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。

一、与蔡廷锴的两次对话

1月29日午后，斯诺匆匆赶往真如采访正在指挥部队作战的蔡廷锴。在那间被当作战地指挥所的简易小茅屋内，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十九路军的指挥官。斯诺眼前的蔡廷锴，一副广东人长相，强健而干练：

身高六英尺，肤色黝黑，其貌不扬，年过四十但看上去像三十岁上下。虽然身经百战，却只穿着没有勋章装饰的普通橄榄色军服。厚嘴唇、大嘴、鼻子宽大而扁平。他亲眼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双又长又直的手。一对栗色眼睛充满活力、智慧和警惕。

两人的第一次对话大致谈了三个问题：战事起因、十九路军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外国人的关系。

谈到起因，蔡廷锴愤慨地说：“他(盐泽幸一)提出的最后通牒，我们的市长都无条件接受了。可他在昨夜11点25分又提出第二道最后通牒，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华界，他们要在半夜12点进行占领。通知这么急，即使我们想撤退也来不及。至于成千上万正在家中熟睡的中国平民，他们更不可能得到了什么警报！”他接着说，十九路军原本要在29日上午撤退，南京已经下达了命令。在日方接受了市长的答复之后，部队已经开始拆除街头的防御工事，而且昨晚已经从闸北前线撤回了警戒人员，原本打算在今早完成全部撤军。昨夜12点差10分的时候，日军开始袭击我们，率先

还击的是闸北的宪兵，而不是士兵。直到凌晨，他才得知盐泽的第二道最后通牒。

“十九路军是否考虑撤退？”斯诺接着问。“当然不！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？战争又不是我们挑起的，我们也不想打仗。日本人可以随时撤离中国，这样战争就结束了。……我们打算求助国联，我们要自己来打这场仗。”蔡廷锴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在谈及与外国人的关系时，蔡廷锴请斯诺给租界内的外国军队传话：“我们无意进入租界，或伤害任何外国人。当然，所有外国军队，包括美国军队在内，都没有权利驻扎在上海租界。但我们相信，他们只是想要保护侨民，不会攻击我们。”

21天后，新任日军指挥官植田谦吉，再次送来最后通牒，要求十九路军在48小时内后撤20公里。为此，斯诺第二次前往真如采访蔡廷锴。他的答复很简单：“任何独立国家都不能接受植田的要求。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宗主权。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，并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。只要还剩下一个中国人，我们都决不会答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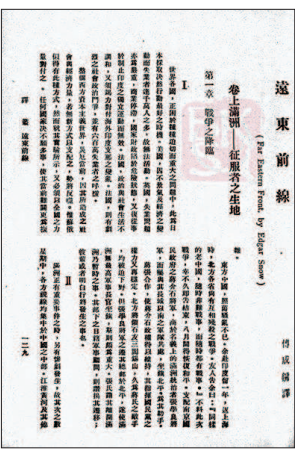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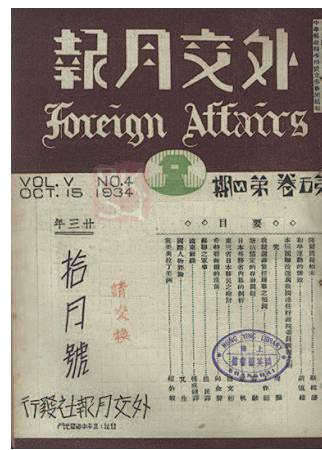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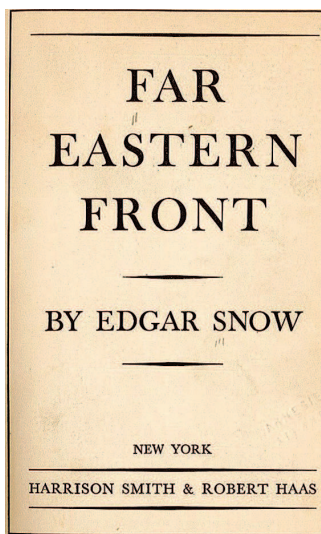
斯诺的同伴问道：“我可以把您的话转告植田将军吗？”

“你可以告诉他，枪炮就是我对他的唯一答复。”

二、十九路军士兵印象

在蔡廷锴的指挥部外，斯诺见到一列列身着灰布军装，头戴塔形斗笠的士兵正开赴前线。对于这些勇士，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：“他们虽然一般比日本兵个子高些，但在体格、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日军。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放了假的学生，而不是开赴战场的战士。有些人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，身子单薄。他们的制服是用最廉价的布料做成的。虽然已是隆冬，许多人还穿着短裤，而且没有大衣。”

“你愿意和日本人打仗吗？”斯诺问了一名正在挖战壕的士兵。



上图：1934年第四期《外交月报》刊发了傅成铺译的《远东前线》左图：埃德加·斯诺著《远东前线》

他脸上先是浮现出那种中国军人特有的善意微笑，然后举起手中装有刺刀的步枪，“我用这个和日本兵碰面，”他一边说一边恶狠狠又略显滑稽地对空刺杀：“日本人杀害我们的同胞，强占我们的土地，我当然要和他们决一死战。”同样的问题，斯诺又问过很多中国士兵，回答都是一样。在斯诺看来，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真挚的。两名广东士兵向他保证：“我们宁愿死掉，也不会让子孙给海岛上的皇帝当牛做马！”

对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表现，斯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他认为这支部队改变了中国军队无力进行现代战争的刻板印象。在解释他们为何能有如此英勇的表现时，斯诺首先将原因归结为不错的军饷和伙食供给。不过，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悠久的革命传统。十九路军的多数士兵曾参加过北伐，而它的核心曾在广州接受过以加仑为首的共产党顾问的训练。

他认为这支部队的年轻军官和士兵不仅在军事上，而且在政治上受过教育。与一般的中国军队有所不同，它的士兵都是志愿招募的而不是强拉来的。他们多数是具有政治信念的青年，识字率也相当高。……下级军官和士兵似乎受到某种革命目的的熏陶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。日本人声称，在十九路军的官兵中，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同情者。斯诺也认可这种看法。他指出，共产党的影响无疑是造就这支军队革命战斗精神的因素之一。

三、战区一瞥

交战期间，要从上海的一个区域前往另一个区域不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而且必须面对各种艰难险阻。人们不光要面对各国士兵的盘查，而且还可能随时遭遇空袭和地雷。斯诺的一段文字，生动地记录了这种困难：
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发现桥被占领了，并在横跨路挖了很宽的战壕，地上也埋了地雷。由于无法说服哨兵让我们把车开过去，只能花费3个小时步行返回租界。我们遭到扣留又被释放，放了又扣，被勒令出示护照和照片；知道我们是美国人后，又给我们道了歉。直到清晨三点，我们才抵达了英国人的防区。

尽管如此，这种“迁徙”却为斯诺带来了很难得的写作素材。从真如返回租界的途中，斯诺

绕道进入闸北。尽管这里已是战区，而且机枪就在不远处哒哒作响，但他见到街上的人们并不惊慌，一些店铺仍在营业，手推车和人力车继续来往。这里的居民似乎远比租界里的人更镇定。

各色人等都成了十九路军的后援，他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支持前方的作战，这一团结御辱的场面令斯诺印象深刻。在闸北附近的田间地头，他看到农民们正帮助士兵挖战壕。成百上千的学生，自发参加了志愿服务队。有些担任救护车司机，有些成了担架队员和护士，有些则充当天线员和做各种能够协助军队的工作。童子军负责送信，闸北志愿队还暂时编入了军队。医生和护士自发在闸北火线的后面设立了野战医院。租界里的人们则把食物、糖果、衣服和书刊送到了前线的士兵手中。有一家乐器店几乎把它所有的留声机都捐了出来。在机枪声间歇的时候，人们可以听到留声机正在播放最新的爵士乐。世界各地的华侨在得知“一·二八”战事打响后，也纷纷汇来捐款，或认捐食物、弹药。

上述景象深深打动了斯诺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表现出西方人所熟知的爱国主义。人民大众开始崇拜这些敢于献生死的南方青年士兵。当我看到一个熟识的、本来很娇气的、喜欢唱歌的中国女孩来到前线抬担架的时候，我发现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撼了！

四、日军暴行

作为战事的亲历者，斯诺亲眼见证了日本人的种种暴行。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，最终使他难以承受。

在蔡廷锴的指挥部附近，他目睹了空袭过后真如车站的惨状。在凶残的袭击之后，车站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，此外还有十几节残破的车厢。……好几颗250磅的炸弹直接击中了车站和停靠在这里的火车，即使在100码开外，斯诺也受到极大的震动。在被毁的车厢中有一个不幸的青年，遇难前的一刹那他还一边吃着人们送来的米饭，一边开着玩笑。突然，他被炸飞到半空，或被从破裂的车厢里抛了出来，他的身体被猛撞到好几码之外的墙壁上。

车站里原来聚集着许多士兵和一些平民，全都遇难了。在一些遗体上，看不见一点弹片造成的皮外伤，因为都死于剧烈的冲击波。冲击波甚

至把他们的衣服全部吹没了。他们赤裸裸地以各种痛苦的扭曲姿态在站内和月台上躺了一地。……这种因冲击波和高温致死的景象，比被直接击中更惨不忍睹。

在整个“一·二八”事变期间，日军和日本浪人，以抓捕“便衣队”为名，随意拘捕、关押和杀害中国平民。(详见蒋杰：《魂归何处：一·二八事变中的“失踪人口”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20年第9期)这一惨剧在斯诺的笔下也得到了印证。他写到，他们在后方的几百个村庄里抓人，但很少有人获释。……一些人被押到江湾等地的刑场，不幸成为胆小的日本新兵的刺杀对象。日军要通过这种方式，把他们训练成凶残的老兵。

在日军战线后方的田地里，到处横陈着听任野狗撕咬的被害农民的遗体。斯诺亲眼见到他们被枪杀或被刺刀捅死。有一天，他进入了一个日军占领不久的小村庄。一些中国平民，包括一两名妇女，被驱赶进一片小竹林。日军随即放火点燃了这片竹林。惊惶的人们从火丛中跑出，随即遭到枪杀。

日军控制闸北以后，斯诺第一时间赶去探访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更为疯狂的暴行。他写到，已经连续打了34天仗、疲惫不堪的日军，现在完全占领了闸北。和他们一同到来的是日本浪人，这些年轻的亡命之徒正系统地破坏这个原本拥有50万人口的城区中剩余的建筑物。在交战停止很久以后，他们还放火烧毁了许多工厂、办公楼和民房。他们还放火烧毁了许多工厂、办公用品，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，有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桶里倒出汽油，重新点火。

日军所到之处，狼藉躺卧着平民的遗体。斯诺看到一对母子，母亲抱着孩子，两人似乎是被刺刀一次穿透的。他又来到一家敞开店面的米铺，发现这里成了一所临时火葬场。店里已堆起四层中国平民的遗体，日本浪人还不断拖来更多的遗体，准备点火焚烧。看到斯诺的出现，他们露出凶光。三名日本士兵走了过来，用刺刀指着斯诺，命令他走开。

这种场景，斯诺见到太多太多。无论在闸北，在虹口，在江湾，还是在庙行，在大场，在吴淞，这种因日军暴行而造成的人间惨剧随处可见，数不胜数。残暴血腥的场面，终于让他无法忍受：

我够惨了。我的脑海里充满着的一幕幕恐怖和残杀的景象——在吴淞、江湾、闸北、虹口、大场和十几个小些的镇子。我想到数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、损失和死亡，无端被屠杀了，事先连个警告都没有。

如果说斯诺通过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可能也是最早向西方社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人之一。他在《远东前线》中指出，“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：为了保卫日本关东‘租借地’，必须占领满洲。更早一些，他们的军事理论是：为了保卫本国，必须占领朝鲜”；而“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：为了保卫热河，需要占领华北”。日本军阀总是会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来为他们的扩张辩护。遗憾的是，斯诺的预言和警告并未引起西方强权的重视。在不断的妥协、绥靖之下，日本的野心和胃口越来越大，最终引发了五年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九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。

作于一九三九年，中国美术馆藏



洛克虽以哲学名世，亦是一典型的如艾迪生与斯蒂尔这样的英式随笔大家。其《人类理解论》这样的哲学大作中，取譬不断，非一般高头讲章可比。同是英人的亚当·斯密，亦非例外，不说他早期的短篇论文，即是《国富论》这样的经济学论著，亦处处都有随笔风。

“时髦的假发”

《人类理解论》篇首献辞中有一段曰：“有的人在判断他人的头脑时，亦同判断假发似的，要以时髦为标准；这些人除了传统的学说以外，一概加以否认。因此，他们如果诬为新奇，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。不论任何地方，任何新学说在其出现之初，其所含的真理，都难以得到多数人的同意；人们只要遇到新意见，则常常会以怀疑、加以反对，而并无任何理由，只是因为它们不同凡俗罢了。不过真理如黄金一样，并不因为新从矿中挖出，就不是黄金。我们只有考验它，考察它才能知道它的价值，而不能凭是否具有古典的样式来衡量。它虽然不曾印有公共铭印通行于世，可是它仍会同自然一样，并不因此稍损其真。”

此时髦之假发之比，极有趣。所谓“时髦”，盖有多种：或即流行，人人争而趋之；或即不过是流俗，相争相承，于人人似为不言自明、不言而喻，百代而自为“时髦”者；或为争奇炫怪，似为与众不同，即一般之所谓“个性”，而内在却是别一种“凡俗”，亦不过从俗之“不俗”。凡此种种不同，所同者一也，即重“样式”，而非内容。样式是向外展示，便专求外在人之认同。一有认同之追求，便是“凡庸”，只是种种“外衣”各不相同而已，本不在于是“新”是“旧”者也。

“打猎”

《人类理解论·赠读者》篇云：“一个捕百灵和麻雀的人，比从事于高等打猎的人，所猎的对象虽逊，其为快乐则一。”

凡做事做学问，其实过程的快乐大过结果。但如今却以结果定高下，过程之快乐全失。又云：“理解之追寻真理，正如弋禽打猎一样，在这些动作中，只是‘追求’这种动作，就能发生了大部分的快乐。心灵在其趋向知识的进程中，每行一步，就能有所发现，而且所有的发现至少在当下说来，不但是新的，而且是最好的。”

一个是过程的快乐，一个是“当下的结果”视作最好，两者其实是统一的，肯定当下结果

南风之薰

洛克的比喻及其他

李荣

亦是过程快乐的一部分。如果永远以未来之“更好”而比较当下结果，则过程之快乐亦全失。

“灯光”与“走路”

《人类理解论》卷一《引论》中有二妙喻，或皆可作今人于人类未来之“喻世明言”。其一曰：

“一个懒散顽固的仆役，如果说：不在大白天，他就不肯用灯光来从事职务，那实在不是能宽恕的。我们心中所燃的蜡烛已经足够明亮可以供我们用了。我们用这些灯光所得的发现就应该使我们满意。”

人类逐日之劲头，亦是人类之可赞美处。但其“心中的明灯”却是不可暗淡，能够明白即使没有了遍照大地的天光，回进漆黑一片的黑洞与小屋的时候，一点星火却也是能够看清眼前的东西，也是能够温暖彼此的心意与生活。只有如此，当明天重见天日，回向遍照大地的天光，又有了逐日的劲头，那么这样的劲头便不可能是不知“天高地厚”的蛮劲，而是有了黑屋里那点“星火”的底色了。

其二曰：“如果我们因为不能遍知一切事物，就不相信一切事物，则我们的做法，正同一个人因为无翼可飞，就不肯用足来走，只是坐以待毙一样，那真太聪明了。”

不能飞，连走也不要了。此是人类无知“膨胀”的一种归宿。回溯人类历史，此种“膨胀”已是几度轮回。但人类本性无法改变，此种“膨胀之轮回”亦是无法终结。最近几十年来，新的“膨胀轮回”又在到来，一心想要“有翼飞上天”。今后，人类“膨胀期”一过，“因为无翼可飞，就不肯用足来走”，便极可能进入另一极端。洛克在此下了两个“判词”：一是怀疑；一是懒惰。此“怀疑之懒惰”是一个极端对立的矛盾体，内里极端地怀疑无确信，外在却是极端地自信无可疑；内里极端地懒散无坚决，外在却是

极端地“奋进”无回旋。不过，这种轮回是人类根性里的东西，一切警世的通言、明言、恒言，终归还是“无言”罢了。

“地平线”与“大海”

《人类理解论》卷一第一章引论之结束处，有两处比喻，引人思考。其一是“地平线”之喻：

“人们如果仔细考察了理解的才具，并且发现了知识的范围，找到了划分幽明事物的地平线，找到了划分可知与不可知的地平线，则他们或许会毫不迟疑地对于不可知的事物，甘心让步公然听其无知，并且在可知的事物方面，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推论，以求较大的利益和满足。”

地平线之外之不可见之物，我们可悠然视之而听其无知，涌出崇高之感情。亦一乐也。

另一处又有一“海”之喻，与“地平线”可连类而言曰：

“一个水手只要知道了他的测线的长度，就有很大的用处，他虽然不能用那线测知海的一切深度，那亦无妨。他只知道，在某些必要的地方，他的测线够达到海底，来指导他的航程，使他留心不要触在暗礁上沉溺了就够了。”

海天相交处，地平线亦即海面，地平线之喻与海之喻便成同一个比喻。海深莫测，人类于海洋始终怀敬畏心，求知欲望亦以此敬畏心为准确与“测线”，否则人类便极易偏向无知妄作之路。此海喻，可联想及现代理论物理学中之“狄拉克之海”，真空不空，人类日常观察力所不可见之“负能之海”，广大充满，无有空隙，正与海底世界相同，不可见、不可测却知其存在。人类至此，其“逻辑智慧”亦可满足，于深深海底投以敬畏心后，转到海面之上，耕耘属于人类的生活吧。

“一场聚会”

《人类理解论·赠读者》篇中，述及此一名著

产生之缘由，有关一场聚会：

“有一次，五六位朋友，在我屋里聚会起来，就谈论到与此题目相距很远的题目。谈论不久，我们就看到各方面都有问题，因此我们就都停顿起来。在迷惑许久之后，既然没有把打搅我们的困难解决了，因此，我就想到，我们已经走错了路，而且在我们开始考察那类问题之前，我们应该先考察自己的能力，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所能解决的，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。我向同人提出此议以后，大家都立刻同意；都愿意以此为我们的研究起点。下次聚会时，我就把自己对于自己从未未谈过的草率、粗疏的思想写出来，作为这篇谈论的入门。”

凡如此的谈论，只要不是存心有所恶意或偏见，亦无有意之抬杠，能够诚心尽意，敞开心怀，畅叙所思，却无法得出什么结论，那就不免如洛克此处所言，应该想到是否“走错了路”。所谓错路大致有二条：一是前提与条件。凡人入之所思，潜在皆以一定的前提、范围与条件为限而展开。但这样的前提、范围与条件却往往并不显而易见，而是隐在暗处，于人茫然无所觉。如此，则人之谈论，或无视人之思想之大前提、大条件，悬想人所无从把握之“终极问题”，所论没有结果是当然的。故洛克提出应首先考察人之“理解”之适用范围。或所论看似同一论题，而隐含之范围、条件各不相同，各人无所觉知，“公说公理、婆说婆理”亦是当然。这种隐含前提、条件之显性化，只能在更高一阶之论域中才能看得分明，人之科学、认识及思想之突破，全在于此。二是语言。人之所论，全用语言表达而展开。有时虽用语言同说一样的话，但各人所用同样语言所赋之语意却各有不同，“表”同“里”不同，无法分别，所论便难趋同意。洛克《人类理解论》后有详细论述，后世之语言哲学及符号论，亦甚关注于此。

知“够了”，“不够”才有意义

《人类理解论》卷一之《引论》章曰：“我如果能发现了理解的各种能力，并且知道它们可以达到什么境地，它们同什么事情稍相适合，它们何时就不能供我们利用——如果能这样，我想我的研究一定有一些功用，一定可以使孜孜不倦的人较为谨慎一些，不敢妄测他所不能了解的事情，一定可以使他在竭能尽智时停止起来，一定可以使他安于不知我们能力所不能及的那些东西——自然在考察以后我们才发现他们是不能达到的。”

思考“理解”，其实即是思考人类之“边界”与“分寸”。于某一种意义上言，人类之努力与精进，即洛克氏所谓“孜孜不倦”者，固然是人类之一大特异处。但如果人类内心没有那个边界与分寸，不知何为“竭能尽智”，总自诩或自以为“全智全能”，无坚不摧、无难不克，则其不止步处，恰是其局限处，更或是其自毁处。洛克氏此处的“谨慎，不敢妄测、停止、安于”诸语，对于人类正是极好的醒脑剂。特别是处于当今人类所谓文明之“烂熟期”，前瞻或后顾都自认为有如许积累之知识可以依傍，触手即可创新，只有“不为”、“没有”、“不可为”，那么“知止”的人类意识对于人类自身实在是关乎大者，绝不可轻视之。人类懂得自己的边界和分寸，知道自己的“止步处”，其实并不即是停步不进。“知止”恰如近世法兰克福学派肯阿多诺所谓“否定之辩证法”，当人在做“肯定之事”的时候，心里总要有一个“否定的边界和分寸”在那里“值班”。知“够了”，“不够”才有意义；有了“知足”的底色与底气，知足、不满足才有了健康的“体质”。否则，任何诸如“只有更好，没有最好”“只有做不好，没有做不到”“变不可能为可能”之类“鼓励”的话头，都可能只是人类的自我愚弄而已。

